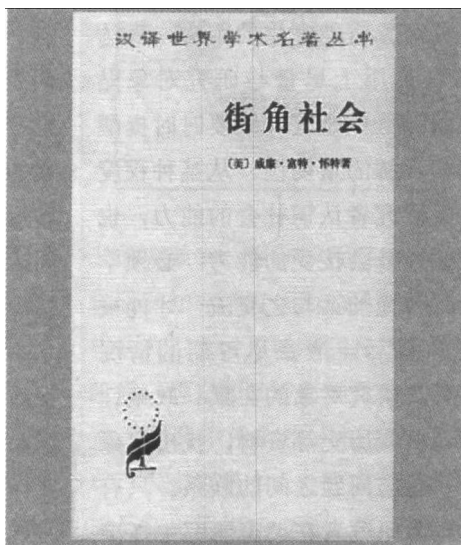


# 破解中国社会调查的统计迷思

## ——兼谈实地研究的洞察力

□ 王迪



42

认识社会结构与解决社会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具体而言，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有4种，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其中以前两种较为常见。统计调查属于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实地研究走的则是定性研究的路径，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社会科学界中的定量研究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以实地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常常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调查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常常有人把“社会调查”和“统计调查”混为一谈，认为“没有问卷、没有数据，就谈不上调查”——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统计调查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源于人们对于实地研究等定性方法的认识不足、了解不够。



### 方法之辩：定量的统计调查VS定性的实地研究

统计调查法是指调查者使用标准化的问卷、表格，通过直接询问或者由调查对象本人填写的形式收集资料，并采用统计分析等手段对资料进行解读的研究方法。统计调查之所以被广为使用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其方法论背景（实证主义、或客观经验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自孔德以后，斯宾塞、涂尔干们都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化方法，以数学化和统计性的形式为取向，以规范性、精确性、客观性为标准，对社会整体的各种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在很多人看来，唯有此法，才能使得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具有说服力和实用性的科学。第二，在近代数理统计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抽样调查方法，确保人们从总体中选取一部分代表进行调查，即可推论出研究对象的总体特性，进而达到从部分到总体、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目的。第三，统计调查是通过对大量研究对象的测量，获得“面”上的情

况，具有概括性的描述能力与结构性的推断能力，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现象，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最后，统计调查通常都是在某一时间点、或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全貌进行研究，时效性相对较强，在社会状况发展变迁迅速、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具有更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学界研究、市场调查、政府部门调查的青睐。

尽管定量的统计调查具有以上种种优点，但也难免会有其自身的盲点和局限。比如在理解社会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统计调查就显得不够深入；而如果缺乏在这些方面的认识，就很难有效地回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平和信任问题。又比如，想了解在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的背后，某类社会组织或某个群体内部的实际操作、运行情况、潜在逻辑，也是统计调查法力有不逮的。在这些领域和场合，实地研究往往具有统计调查所不具备的优势——即挖掘深层次的事实和事件背

后隐含的意义。

与统计调查“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进行调查—证实（或证伪）假设”的演绎逻辑不同，实地研究遵循的是“从事实出发—收集资料—进行经验概括—提炼理论”的归纳逻辑。这就要求研究者“悬置”原有假设、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利用观察和访谈（特别是深度访谈）等方法，直接到社会生活中收集资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经验资料中得出一般性推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到场”，即深入到研究现场、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去体察，以了解社会事实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理解社会现象的含义和个体行为的意义。

44

“到场”这一做法造就了实地研究最大的优点，即，能够深入详细地了解事物全貌与“自然状态”（而非面对调查时蓄意呈现出来的状态）下的实际情况，比如某个人、组织或群体、某个社区或村庄、某种状况或事件的真实表现、确切关系、以及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即演变史）。在这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民出版社，1957）、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1994）、布若威的《制造甘愿》（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等著作都是广为熟知的实地研究的代表，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阶层、社区、群体和组织等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状况。而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也有大量实地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展

现传统社会形态的《江村经济》（费孝通，商务印书馆，2001）、《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三联书店，2008）、《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等，以及体现了当代社会变迁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飏，三联书店，2000）、《大河移民的故事》（应星，三联书店，2001）等。

实地研究可以进行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也可以对某类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性研究。实地研究与统计调查的“解释”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发现的因果关系常常仅停留在统计层面，只是数字意义上的相关，这种解释未必在真实的社会现象中发挥作用；而通过对一个或少数个案的详细考察，可以发现真正影响事物的主要因素和基本逻辑——也就是说，实地研究的解释力或许没有统计调查那么具有代表性，但这种解释力来得更加真实可靠。同时，以民族志研究为典型，对文化、仪式、象征和符号的观察、访问和解读，也一直都是实地研究专擅的研究领域。

既然实地研究可以通过对少数研究对象的全面细致的调查，获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具有较强的探索性与解剖性，那么为什么这种方法的应用却不及统计调查广泛呢？笔者个人看来，首先是因为实地研究需要研究者“到场”，到研究对象发生、发展的具体场域和现实情境中去，走进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进而对过程进行

把握、对意义进行理解，因此，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耗费更多的精力——而这样的周期和投入往往是调查者不愿意承担，或者来自各方面的条件和压力不允许接受的。

另外，在很多人看来，与统计调查截然相反的是，以人文主义（或诠释经验主义）为方法论背景的实地研究“不够科学”，仅仅是建立在少数个案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缺乏概括性、结构性与代表性，不能对大规模群体的特征进行推论。但实际上，全面的实地研究不仅要调查个案本身和收集实地材料，也要将其背后的社会脉络和文化背景纳入到考察的范围当中，特别是注意个案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后果。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观察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影响力，既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又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从而跳出了实地研究的局限，可以将宏观视角与微观层面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 从实地研究透视社会结构和宏观问题

要说明实地研究如何将微观层面与宏观视角相结合，从而以小见大，从日常生活透视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项飏博士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一书无疑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极好的例证。《猎身》是项飏博士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地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成果，该书以印度IT人通过“劳力行”（Body Shop）实现跨国流动的经历为切入点，在“印度社会结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劳动力市场”几

者之间建立了联系，揭示了社会结构不平等如何生产和服务于全球分工不平等的模式，立意深刻、视角独特且分析透彻。

说起印度IT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人会想到印度拥有劳动密集型行业最需要的、受过英语教育的人力资源；但实际上，在《猎身》一书进行实地调查的2001年，印度的文盲率高达35%（到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6%），且技术人才的存量和增速都不如中国，因此很难简单地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印度IT业的成绩。项飏博士独辟蹊径，从劳动力猎身体系、技能培训和社会结构等几个角度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猎身体系”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体系——即由印度人开办的职业代理公司（“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项目需要把“IT民工”们派发给客户，而且代表客户管理工人（包括提供担保、办理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所有环节）。并且，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规模之间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彼此合作、联合行动，进而形成“中介链”，随时将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通过这样的过程完成的“猎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外流、劳动力输出的过程，而是一种技术服务项目，技术人才的输出在统计上就直接体现为印度IT服务业的产值。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私营IT技能培训机构的疯狂扩张，为猎身体系提供了丰沛的人才源头；而由此造成的大规模的IT人才过剩和IT产业中的高失业率，则让劳力行成为很多IT“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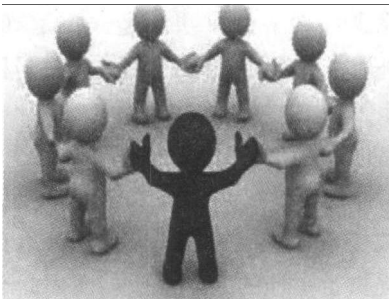
店”（即T-Shop）的毕业生们不得不选择的就业渠道。与此同时，这些技能培训机构的课程设置均与时俱进，以美国IT业，特别是几家全球化大公司的专业标准为风向标，以获得在西方国家IT行业任职资格为最终目的，从而实现与国际IT产业需求的完美契合。

但无论是“猎身体系”的发展还是“技能培训”的扩张，都对经济因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社会角度来看，办高等教育、培养IT人才需要聚集大量的财力、物力。从个人角度而言，每个要换取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机会的IT人都要向劳力行缴纳高昂的中介费用和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而由于“金融化”IT产业的不稳定性，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行业的常态，很多IT工人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就被招到海外待业，成为“板凳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费而没有工资；在项目与项目之间，这些工人又被重新闲置在板凳上；一些失业的IT人，或者零起点（没有工作阅历）的年轻IT人甚至需要向劳力行缴纳费用，来购买特定的内部岗位

（如“实习生”或“软件开发师”）——“美国梦”成本之巨、代价之大，由此可见。那么，对于那些印度IT人乃至整个印度社会而言，如何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呢？

在印度社会中，由历史形成的高度不平等的种姓、阶级和性别关系，是其能够承受上述负担的重要原因。大量低种姓、下层阶级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远远低于他们的付出，妇女工资也相当低廉，从而为积累农业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而农业盈余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被投入到印度高等教育，特别是多半由大地主和当地政要们联合兴办的私立IT学院当中。同样由于种姓制度的遗留，“农业反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仅限于6%的适龄青年，且绝大多数出自于所谓的“高级种姓”家庭。低廉甚至无偿的底层劳动，为培育IT人提供隐性资源——项飏博士将这种现象归纳为“通过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汲取剩余资源”。

与中国社会类似的是，亲缘关系（家族圈子借钱）是资助印度年轻人接受教育或者出国从事IT工作的重要资源途径。而与中国不太相同的是，印度（特别是南印度地区）的姻缘关系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动员方式：男青年如果成为IT工程师，特别是在海外找到一份IT行业的工作，结婚时将会从女方家里获得大笔的嫁妆，这不仅能够使他的IT培训费、出国中介费全部“回本儿”，还使他有闲钱、有能力承担在海外沦为“板凳工人”的风险。可以说，印度社会结构中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甚至



驱动了印度男青年不惜血本学IT、削尖脑袋要出国的行为。这一方面促进了印度IT产业业绩的膨胀；另一方面，将印度社会中通过种姓、阶级、性别不平等所累积起来的资本，转移到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

### 《全球“猎身”》的方法启示

《猎身》一书包含了极度生动的故事和异常丰富的信息，以清晰的逻辑线索将“IT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劳动力生产与配置系统—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展现在读者面前。《猎身》之所以能够将看似寻常的IT人跨国流动的经历，提升到针对社会历史文化、结构制度安排乃至国际经济秩序的洞见，其思考和分析的过程中有很多亮点；仅从实地研究的方法角度而言，笔者觉得该书至少带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研究者并没有将先验的假设或判断带入研究田野当中，才能够确保这项研究的发现和观点不落“人才决定论”的窠臼，在视角上有所创新。项飏博士在调查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甚至都没有确定“猎身”和“IT人跨国流动”的主题，而是在不断的访问、迷茫和坚持中修正着研究的方向。这也印证了实地研究的特点之一：明晰主题的过程、收集材料的过程、分析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三者合一的。

其次，实地研究对调查者的要求是，不仅在身体上“进入”调查的田野，更重要的是真的“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里去，用“局内人”的视角，形成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和具体情境的参与观察和内部

理解。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研究者只有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项飏博士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鲜活事实，得益于他全身心地“融入”调查的环境，通过“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IT工人合住过”、“毫无顾忌地和5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这类的做法，成为IT工人中间自然而然的一分子，而完全不打破其原本的生活状态，没有扭曲他们最真实的观点和行为；同时，与被调查者建立一种信任、依赖的关系，甚至成为亲密的、无话不谈的朋友，以至于不需要研究者发问，那些IT工人们就会主动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主动讨论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如何处理群体内部复杂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虽然这项研究的访问对象有近百人，访谈和观察所得的资料极其庞杂，但研究者并没有被这些琐碎的、日常的资料所湮没，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实地研究那样成为对资料的机械堆砌和简单排列，而是将若干IT工人的个体生活史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文化背景、社会脉络、制度体系等）关联起来，从而在表层事实的背后，形成了对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洞察——这样的思考方式，也是我们运用实地研究方法进行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时可以借鉴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